

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

卞仁海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对外汉语系, 广东深圳 518060)

摘要: 杨树达是著名国学大师, 文章从段王之学的继承、湘学传统的发扬以及时代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杨氏训诂的学术背景。处于中国语言学转型时期的杨树达, 训诂成就之所以卓著, 有其时代背景和个体因素。概而言之, 其训诂远绍乾嘉段王, 近承湘学余绪; 既被西学东渐之风, 又熔甲骨金石之学。

关键词: 杨树达; 训诂; 学术背景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1-0146-06

杨树达(1885~1956), 近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湖南长沙人, 字遇夫, 号积微。杨树达的语言文字研究涉及文字、训诂、语法、修辞、音韵和方言, 而陈寅恪先生尤其推崇杨氏的训诂研究, 称他为其时“神州训诂学第一人”^[1]。杨氏的训诂著作主要有《积微居小学述林》(下简称《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下简称《论丛》)、《汉书窥管》《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论语疏证》等。本文拟从对段王之学的继承、对湘学传统的发扬、时代的影响几方面来论述他取得如此学术成就的学术背景。

一、对段王之学的继承

乾嘉学派接踵于清代“康乾盛世”, 其训诂之学上承先秦汉唐以来的训诂渊源, 下启近代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杨树达, 成为训诂学史乃至学术史上的里程碑, 它标志着传统语文学进入了语言学领域。乾嘉学派主要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 而其训诂学又以皖派戴震的受业弟子段玉裁和王念孙成绩为最大, 代表了清代训诂学的最高成就, 世称“段王之王”。

段王之王在学术成就上, 突出表现为系统化、理论化的音义观。梁启超说:“所谓‘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申触类’, 实清儒治小学之最成功处。”^{[2](202)}训诂之旨, 在于声音。而汉唐以来的训诂诸家尽管留存大量

的声训材料, 如《释名》的声训、北宋以来的“右文说”等, 但对音义关系的认识, 始终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他们或拘于声音而主观臆断, 如声训; 或泥于字形, 执偏以概全, 如“右文说”。“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 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只到段玉裁、王念孙, 才冲破这个藩篱。”“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 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 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3](157)}乾嘉学者音义关系认识的突破, 使他们能从本质上认识文字形、音、义的关系以及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训诂学也因此进入了语言学领域。因此, 黄侃说:“清代小学之进步, 一知求本音, 二推求本字, 三推求语根。”^{[4](12)}这种“革命”性的成果, 集中体现在郝氏《尔雅义疏》、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父子《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训诂专著上。

对“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学风的恢复和发扬, 也是段王之王的一大特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总结乾嘉学风有十大特色, 可一言以蔽之:“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种学风的恢复和发扬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明清之际, 社会动荡, 理学空疏衰败, 清代学术开山之祖顾炎武高举反理学之大旗, 开“朴学”学风之端绪; 中经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的推阐发扬, 迄至段、王而臻于极盛。清代“朴学”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 以经学为主, 学风平实严谨。但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许郑之学”, 而是不墨守、敢创发, 讲方法、有朴素历史观念的新“朴学”。

收稿日期: 2008-06-10; 修回日期: 2008-12-05;

基金项目: 深圳大学 2008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4BRH)

作者简介: 卞仁海(1974-), 男, 河南信阳人, 博士, 深圳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字学。

乾嘉学术以讲究训诂考据为特色，这一特色始终贯彻了新“朴学”的学风。体现在训诂上，表现为：一是严谨、科学的训诂方法。乾嘉训诂凡立说必持之有据，既不盲从，也不妄立，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梁启超就以“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等六端概括王氏父子训诂的科学方法^{[5](43-44)}。二是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训诂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乾嘉学者以“朴学”之实事求是的学风，或校注、或辨伪、或辑佚，拾遗钩沉，阐幽著微，对传统训诂进行爬梳整理，系统地清理和总结了传统训诂著作。李建国就指出：“他们成功地总结训诂学的历史经验，为近代训诂学发展铺平了道路。”^{[6](289)}

杨树达训诂与乾嘉段王一脉相承，王力指出：“杨氏继承了乾嘉的朴学，各方面的造诣都颇深。”^{[3](179)}王氏在评价杨树达的语法研究后又说：“后来杨树达索性继承乾嘉学派的事业，去搞他的小学去了。”^{[3](207)}杨氏年幼即受教乾嘉训诂之书。他自述说：“予年十四五，家大人授以郝氏《尔雅》、王氏《广雅》二疏，始有志于训诂之学。”（《论丛·自序》）而杨氏对乾嘉之学，也深得其要领，他自己就说：“予年十五，……颇知声近义通之说。”^{[7](51)}罗常培指出：“遇夫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得之于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8]

杨氏对段王之学的继承，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他能扬段王之长，又能避其所短。如他对段君“声义贯通”之说多有继承，但段氏多以“凡”“皆”言之，如“凡农声之字皆训厚”，有“右文说”执偏概全之病。杨氏则说“农声字多含厚义”。“皆”“多”一字之改，意义大不相同。

其次，杨氏在段王之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使训诂学走向严密、科学。如王氏突破字形（右文）束缚（如吕、旅），且“深合于以声为义之理”（沈兼士语），但“惜其说散漫，未具系统^[9]。”杨氏不仅突破字形，且长于“创通大例”，如云“几声字多含微小之义、几又有不足之义。”韩宗完说：“他（杨树达）的文字训诂、金石考据，是从高邮二王、金坛段玉裁脱胎来的，平实、细密、无征不信。”^[10]“脱胎”二字，当理解为“继承发扬”；“平实、细密、无征不信”，则完全是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之风。杨树达之文字训诂注重实证，征引博洽，他自己就说：“我于传注之外，凡现代语言及其它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故所涉较广。”（《述林·自序》）杨氏文字训诂不因袭泥古，而是阙疑求真，孤证不妄，他在《答人论文字学书》中就说：“树达近年研讨文字之学，于许书不肯过信，亦不欲轻诋，可信者信之，疑而不能决者阙之，其有订正许说者，必于故

书雅记广求征证，确见其不然，然后信之，若单文孤证，则姑以为假定，不敢视为定论也。”^{[11](305)}

曾运乾曾评价杨氏的文字训诂：“迹其功力所至，大率综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于许氏一家之学，不敢率为异说，亦不敢苟为雷同。每树一义，按之字例而合，验之声韵而准，证之经典旧文而无乎不洽，六通四辟，周币旁皇，直令读者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乐。”（《述林·曾序》）曾氏之语可谓是对杨氏治学之风和方法的集中概括。

二、对湘学传统的发扬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格局，赋予地域学术和学术世家特殊的历史地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杨树达出生于“湘学”形成的中心，其学术自然受其沾被。张舜徽就说：“湖南人的治学精神与江浙一带不同，走的是博通的路。近三百年间，如王夫之、王先谦、王闿运，是清代湘学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问极其广大，远非江浙所能及。杨先生少时承湘学余绪，有志昌大，在前人治学的基础上，更加精进不已。”^[12]

作为地域学术和文化传统的湘学，形成于两宋时期，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王船山（夫之）、魏源、曾国藩是其形成以来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湘学涵及政治、哲学、宗教、艺术、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理学为宗，兼收并蓄，博采众家，维新求变。晚清的经世救亡思潮终于催生了湘学形态的近代转型，即将理学和实学结合，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怀、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魏源由经涉史，以史致用，主张“师夷长技”；曾国藩汉宋兼治，兴办洋务以图存；谭嗣同维新变法，以身殉“理”。

湘学以理学为其传统，以通经致用为要务，而疏于“小学”。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章太炎也曾说湖南“三王不识字”：“荆舒《字说》横作，自是小学破坏，言无典常。明末有衡阳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视荆舒为愈。晚有湘潭王闿运，亦言指事、会意、不关字形。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啗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国故论衡·小学略说》）当然，湘、皖并无高下，学术旨趣、取向不同而已。

杨树达远绍段王，主治“小学”，走的是朴学的路子，有人就谓杨氏“不类湘学”。杨氏日记中曾私下批

评黄侃为学“温故不能知新”，谓其“不皖而吴”^①；套用此语，杨氏则可谓“不湘而皖”了（仅指学风而言）。章太炎就曾夸杨氏说：“遇夫心思精细，殆欲突过其先辈矣。”^[13]其实，湘人治经，只是较吴、皖黯然，但不乏精专。尤以湘人欧阳厚均、贺熙龄等共创“湘水校经堂”以后，以经史实学造士，一时“三吴汉学入湖湘”；道、咸以降，遂涌现出魏源、王闿运、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胡元仪等朴学大师，而杨树达、曾运乾、余嘉锡、张舜徽等便是其遗泽余韵。

首先，杨氏学术的重要方面——史籍训诂，便是与湘人先辈一脉相承的。湘人治史，有其一脉相承的传统。两宋以来，胡氏父子、张栻、王船山均注重治史，其实学特色亦尤为明显：以史为鉴，以史资治。近代以来，湘人经世史学因应时势而兴。魏源由经学入政治，以经入史，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体现出强烈的“以史致用”意识；王闿运，以今文经学名家，史学贡献在于编撰了《湘军志》；另外，李元度、李恒、谭嗣同、陈天华等的史学观和史学著作也都体现出“经世史学”的特色。长沙皮锡瑞通经致用，以经史称名，著有《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封建正统史学方面：杨氏师叶德辉于元史研究见长，所校《元朝秘史》，保留了元抄本的特色；王先谦（葵园）的正统史学成就则以《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为代表。

杨氏少时受其父及乡贤影响，亦好史籍，尤嗜班书，成有《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陈寅恪曾谓杨氏曰：“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诸前辈矣。”^{[14]〔63〕}骆鸿凯述黄侃云：“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15]〔63〕}余嘉锡说杨氏“颂班孟坚书不复持本，终卷不失一字，古所谓汉圣无以远过”。（《论丛·余序》）

其次，更重要的是杨氏继承和发扬了湘人独立、致用的治学精神。杨氏继承了湘人的性格基因。湘人于战刚坚，杨氏为学勤苦，一生手不释卷，著述不辍，以兼人之力，获倍人之功；湘学“博通”，杨氏众采，“思路开阔”，“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湘人倔强、独立，不为古学所囿，杨氏则不墨守段王许慎，为学自辟蹊径，“批判接受”，“前人所受的桎梏，我努力挣扎摆脱他”。因此，杨氏治学，表现出的全是湘人气概：“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14]〔1〕}

杨氏一生潜心学问，设教治学，但经世致用之心未泯。杨氏13岁入时务学堂，梁启超教以《孟子》及《公羊春秋》，鼓吹民权主义，杨深受影响；杨氏弱冠

留日，也是“激于国难”，当时即抱有读书救国大志；1919年，湖南军阀张敬尧镇压爱国运动，杨氏积极参与驱张活动，被推为教职员代表，与学生代表毛泽东等同赴北京请愿。

杨氏治学授业，也多处表现其经世爱国思想。1918年南北战争爆发，杨氏感时伤怀，忧心民生，辑《老子古义》，云：“余念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及‘兵者，不祥之器’诸语，始辑《老子古义》，凡五十日而竟。”^{[15]〔12〕}

杨氏避难辰溪，日机不断轰炸，杨氏愤慨，遂于湖南大学专设“春秋大义”课程，古为今用，根据梁启超当年所授的微言大义，阐述《春秋》“复仇”“攘夷”之旨，并以“迫于迟暮，不能执干戈卫国”自恨。后成《春秋大义述》一书出版。

杨氏治语源训诂，也是为了整理国故，泽被后学，其情切切，云：“方今外寇鸱张，党人偷乐，国家在惊涛骇浪之中，吾人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整理文化留贻子孙，非吾辈任之而谁任之哉？”

杨氏研究语法、修辞，十分强调民族特色，反对照抄他族，认为“吾先民有极精核之文法知识”（《论丛》），他在《中国修辞学·自序》又说：“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求达者殊科。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

三、时代的影响

从时代因素看，对杨氏训诂影响最大的是西方文学语源学和当时国内的甲金之学。

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使大批语言文字学家接触到了印欧语言及其语源学，其科学的思维方法、先进的语源学理论，都对汉语语源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近代汉语语源的研究也因之蔚然成风。杨树达1905～1911年留学日本，“日治欧洲语言及诸杂学”。“声近义通”的根柢，西方语源学的影响，使杨氏在文字训诂时自然要求探求文字的声义之源。杨氏说：“我治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求得一些文字的语源。”（《论丛·自序》）杨氏曾自述其所受欧洲语源学的影响：

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 etymology 的影响的。少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道他们有所谓语源学。偶然翻检他们的大字典，每一个字，语源都说得明明白白，心窃羨之。因此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求语源。（《论丛·自序》）

杨氏“尽量地寻求语源”主要体现在《论丛》和《述林》所收有关文字探源的180多篇文章中。杨氏“尽量地寻求语源”的目的，在于以声统义，更好地进行训诂，他说：“夫义生于声，则以声为统纪，岂惟《尔雅》《说文》《方言》《广韵》当为所贯穿哉，举凡《经籍纂诂》之所纂，《小学钩沉》之所钩，凡一切训诂之书，将无不网罗而包举之矣。”^[7]

章太炎为近代语源学导夫先路，其所著《文始》是第一部对汉语词源作全面研究的著作。《文始》以古声韵为经，以初文为纬，以转注为造字之法，用孳乳、变易为两大条例，系联同族词。“《文始》的问世，标志着新训诂学的开始。”^[16]杨树达的训诂研究自然也要受到章太炎“新训诂学”的影响。杨氏自述说：“1930年，文法三书成，乃专力于文字之学。初读章君《文始》，则大好之，既而以其说多不根古义，又谓形声字不含义，则又疑之。”（《论丛·自序》）《文始》中初文、语根、孳乳、变易等概念都给杨树达的文字探源研究以重要影响。

杨树达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交游甚广，如章太炎、黄侃、郭沫若、陈寅恪、陈垣、沈兼士、曾运乾、余嘉锡、吴承仕、董作宾、高步瀛、于省吾等。杨与时彦或切磋砥砺，或赠著问学、序跋互赠，或书札往来，其文字训诂也于交流中所受沾溉良多。杨氏亦曾自述这种影响：“余撰文字，往往印成讲义。亦偶布于诸杂志，必以其余份寄呈友人求教。诸友意在励余，时时加以奖籍。亦有贡献己意，加以商榷，而余遂据以或改正者；以此余得益甚宏。”（《积微居回忆录·自序》）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杨氏高足张清常曾总结说：“他（指杨氏）有家学的根底，有湖南乡先贤的熏陶，有通过英语所学，有留学日本所学，与当代著名学者交流，再加自己时时勤勉，这样就使他根基雄厚，思路心胸大为开阔。”^[17]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卜辞大出，也带动了金石研究，甲金之学方兴未艾；其时的传统经学因材料先天不足而似乎走向山穷水尽。新发现带来新学问，甲骨文的发现，无疑为传统学术注入了一线生机；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为当时的文史文献研究提供了有力利器。其时的学术界对甲骨文这一新材料有人持否定态度，如章太炎、黄侃（黄晚年有所转变）；有人持观望保留态度，如钱穆。杨树达积极研究甲金文字，并以甲金文字研究名家。杨氏1925年开始接触古文字，“读孙仲容《古籀拾遗》，心颇嗜之。”^{[15](25)}其金石之学的研究实始自1931年，“余近日因考汉俗，涉猎汉碑，时有新获，治金石之学实始于此。”^{[15](57)}自1934年

发表第一篇甲文研究论文以来的20余年，杨氏著有考释甲金文字之文数百篇，专著4种。

陈寅恪在《陈垣墩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8](266)}杨树达训诂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甲金文字的研究和文字训诂结合起来，并积极利用甲金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杨氏依据《说文》而不泥于《说文》，广稽甲金文字，参验《说文》，严格考辨，以进行文字训诂。著名的《释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文·十四篇下·辱部》云：“辱，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疆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按许君于字之从寸无说，释辰为农时，而云失耕时则戮之，然字形中绝不见失时之义也：其非正义，无可疑也。余谓：辱者，𡗗之初文也。《说文·六篇上·木部》云：“𡗗，薨器也，（薨下云：拔去田草也。）从木，辱声。”或从金作𡗗，经典通作𡗗。……许君训为薨器者，薨为拔去田草，即芸草也。古人名动往往同辞，许君以字从木，或从金，故主以器言，而《易》《礼》《孟子》注则指言其事也。必知辱为𡗗之初字者。……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实蜃字之初字，辱字从寸从长，寸谓手，盖上古之世，尚无金铁，故手持摩锐之蜃以芸除秽草，所谓薨也。（《述林·释辱》）

王国维发明“二重证据法”，以甲金材料明史，而杨氏用以训诂（校订《说文》、进行语源研究），也有王氏的影响。杨任教清华时曾与王同事（1926.9～1927.6），杨氏后来著文立说，也多采王氏，如：“王静安著《释物篇》，见《观堂集林》卷六 据殷卜辞勿牛之文及《诗》三十维物《毛传》异毛色三十牛之训，定物字当训为杂色牛，其说确不可易矣。余读《淮南子》，有足证明静安之说者。”（《述林·释物》）杨氏还服膺王氏考据之学，云：“静安先生平生治学，态度谨严，故其所论大都精审可信。”（《述林·书古本竹书纪念辑校后》）

如果说段王音义关系的科学认识及实践是训诂学上的“革命”，那么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甲金之学应用于训诂，是训诂学上的又一次“革命”。王力所说的“革命”是革传统“音义”观的命，而近代甲金之学应用于训诂是革传统“形义”观的命。《说文》囿于时代和材料，未能尽善，而传统训诂视《说文》为圭臬，其形义关系认识始终没有突破《说文》的窠臼。如果说字形控制着中国1700多年的文字学，那么《说文》也控制着中国1700多年的训诂学。仅《说文》中1300多个非形声字，许慎说解不正确者就约有500个^②；董

莲池《说文解字考正》就利用多家的古文字研究考证《说文》中875个汉字的说解错误。曾宪通指出：“就训诂方面而言，如果没有地下真实材料的发现，典籍上某些讹误就得不到纠正。没有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训诂上一些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便得不到纠正。”^[19]近现代以来一大批文字训诂学家利用古文字材料以校正《说文》、纠正故训、确诂文字，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就是这一“革命”的阶段性的成果。而杨树达，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乾嘉学统，湘学余绪，加上西学影响，终成杨氏训诂之学。兹引杨树达的自述来概述其训诂的学术背景：

我自愧功力之深邃不及段、王，但以我的成绩论，又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这并非我的学历超过断王，乃是受了时代的影响。我出生较晚，时代思想有变迁，因此我研究方法与前人大有不同。粗略地说来，第一，受了外来的影响，因比较对照有所吸取。第二，思路开阔了，前人所受的桎梏，我努力挣扎摆脱他，务求不受他的束缚。第三，前人只作证明《说文》的工作，如段玉裁、桂馥皆是，我却三十年来一直作批判接受的工作。第四，段氏于《说文》以外，博涉经传，所以成绩最高，其余的人大都在文字本身中兜圈子。我于传注之外，凡现代语言及其它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故所涉较广。第五，古韵部分大明，甲金文大出，我尽量地利用他们。第六，继承《苍颉篇》及《说文》以来形义密合的方法，死死抓紧字形不放。（《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

注释：

① 杨氏1943年11月9日日记中有一戏联批黄侃：“无周公之才，

既骄且吝；受章君之教，不皖而吴。”（《积微翁回忆录》）按：以上当为杨氏成见之语，黄氏之学自有公评。

② 何金松《汉字形义考源·前言》中的统计。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论丛续稿·序[A]. 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0-11.
- [2]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大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 [3]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大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 [4] 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 [6] 李建国. 汉语训诂学史[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 [7] 杨树达. 论丛·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罗长培. 悼杨树达(遇夫)先生[A]. 纪念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254-257.
- [9] 沈兼士.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A].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6：73-185.
- [10] 韩宗完. 日记里的杨树达[J]. 人物，2003，(11)：18-25.
- [11]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 王玉德. 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J]. 文献，1997，(4)：23-26.
- [13] 章太炎. 章太炎致杨树达[A]. 纪念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2.
- [14]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5] 杨树达. 积微翁回忆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6] 杨润陆. 《文始》说略[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4)：43-52.
- [17] 张清常. 忆遇夫师[A]. 纪念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281-282.
- [18]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三联书店，2001.
- [19] 曾宪通. 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与训诂问题[A]. 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C].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33-39.

On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Yang Shuda's exegetics

BIAN Renhai

(Normal School,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Yang Shuda is a famous master of studies on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Yang Shuda's Exegetics in greater detail from three aspec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linguistics reforming time, Yang Shuda achieves great success in Exegetical Studies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his hard work.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Yang Shuda's Exegetics carries forward the good traditions from Duan Yucai, Wang Niansun in Qianjia Period, Qing Dynasty, with the benefits gained from his country worthy's related study and ancient writing study of the age.

Key words: Yang shuda; exegetical studies; academic background

[编辑：汪晓]